

DOI:10.12405/j.issn.2097-1486.2026.01.008

编者按: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普及,互联网已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三交”)的新兴场域。近年来,如何在数字化浪潮中通过“互联网+”有效促进民族团结,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更是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然而,互联网使用在微观层面如何具体作用于民族“三交”,以及民生“三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其中扮演何种机制角色,尚待深入的实证解析。此文中,云南农业大学莫力副教授团队以多民族聚居的贵阳市为例,基于一手问卷数据,系统梳理了互联网使用对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三个维度的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性地揭示了民生“三感”在不同互动层次中的中介效应差异,并探讨了不同民族间存在的异质性表现。该研究不仅丰富了民族地区数字治理的理论内涵,更为相关部门优化差异化政策、弥合数字鸿沟提供了宝贵的实证依据和实践路径。

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及 作用机制研究 ——以贵阳市为例

莫力,黄淋妮,陈颂*

云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民族地区居民利用互联网开展民族间交往、交流和交融活动,既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红利,又面临感受不明晰、互动不足和网络意识形态入侵等问题。本文以贵州省贵阳市316份问卷数据为例,基于Stata 16.0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和交融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民族地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民生“三感”)在互联网促进交往和交流过程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但对高阶交融无显著中介效应;此外,互联网使用对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交流与交融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而在基础交往方面该异质性不明显。研究建议加强民族地区互联网普及与技能培训,关注民生“三感”的实际状况,优化差异化政策,推动“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关键词:互联网;民族地区;民族交流;民族交往;民族交融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1486(2026)01-0082-11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use in the ethnic areas on the interaction,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nd its mechanism: taking Guiyang city as an example

MO Li, HUANG Linni, CHEN Song*

College of Marxism,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advancement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idents in ethnic regions are increasingly using the Internet to engage in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While benefiting from the dividends brought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y also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unclear perceptions, insufficient interaction, and ideological infiltration online. This study takes 316 survey responses from Guiyang City, Guizhou Province as a case,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tata 16.0.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ternet us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ex-

*通信作者

基金项目: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与咨询项目(2023-PP-03)

收稿日期:2025-07-07;修回日期:2025-08-17

changes, and integration in ethnic regions. Furthermore, residents' sense of gain, happiness, and security (the "three senses" of wellbeing) play a positive mediating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s via Internet use, but do not have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on higher-level integration activities. Additionally, heterogeneity is observed in the effect of Internet use on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Han majority and ethnic minorities, whereas such heterogeneity is not significant in basic interaction. The study recommends enhancing Internet accessibility and skills training in ethnic regions, addressing the actual status of the "three senses", optimizing differentiated policies, and advancing the practice of "Internet Plus Ethnic Unity" to consolidat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Internet; ethnic areas; ethnic interaction; ethnic exchanges; ethnic integration

0 问题的提出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就曾明确强调,要牢牢把握好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1]。民族地区积极响应习近平同志号召,开展多种形式的“互联网+民族团结”的实践工作,着力发挥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科学技术发展相适应、相统一的良性互动关系^[2],由于互联网等新技术的使用必然附着高复杂性和高不确定性的特点,实践工作开展过程中“慢、低、窄”等缺陷也逐渐暴露,难以有效与民族地区居民的切实需求衔接起来,同时对民族地区居民在“互联网+民族团结”交互作用过程中真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欠缺考虑^[3]。

现有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互联网+民族团结”如何开展以及互联网如何与民族产业融合两个方面。在“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工作的研究方面,有学者在论述大数据对民族交流和意识形态带来的影响后,提出了“互联网大数据民族地区党建舆情监控系统”的实施框架,以互联网技术促进民族党建工作的开展^[4],还有学者以民族团结进步微信公众号为例,对“互联网+民族团结”的工作经验进行总结和价值分析^[5];在互联网与民族产业融合的研究方面,有学者以贵州省三个少数民族典型村寨为例,以互联网时代为背景,系统总结了互联网使用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传播的影响^[6],还有学者基于民族地区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情况,分析了现代信息技术对民族地区宗教传播的影响^[7]。

同时,国际研究也普遍指出,技术普及必须与数字包容性并重。Liu H. et al 综述了公共服务数字化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强调应通过包容性界面设计和针对性政策,避免数字排斥^[8];Raihan Mohammad M. H. et al 进一步论证了多元文化和语言背景的考

量是制定有效数字治理策略的关键^[9];此外,Helsper J. E. et al 也指出,互联网技术应注重促进民族地区的信息互联互通与文化融合,强调数字平台在提升民族身份认同和社会资本中的积极作用^[10]。这些研究为构建兼顾普适性与文化敏感性的数字平台以及提升民族地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指明了新的路径,但较少直接关注到互联网使用直接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影响,也鲜有研究将民族地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考虑在内。

鉴于此,本研究以贵州省贵阳市这一多民族地区为例,运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通过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讨论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影响效应,把握好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影响机理,找准民族地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以下简称“民生三感”)在该过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对于“互联网+民族团结”实践工作的进一步优化和互联网使用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结合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1.1 数据来源

为了确保研究的科学性与数据的代表性,研究将贵州省贵阳市作为样本区域,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和交融行为的影响。为探讨民族地区居民互联网的使用情况以及其交往、交流和交融三方面的情况,笔者在2023年7—8月进行网络问卷发放,这种方式可以选取达到互联网使用基本门槛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调研内容为被访者在2022年度的信息。课题组通过限制IP地址的方法控制样本为贵州省贵阳市的居民,调研采取严格的多阶段分层抽样原则:首先,在确认贵州省贵阳市的基础上按照互联网普及

率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抽取共计 3—4 个样本区县;其次,在每个样本县抽取 3—4 个样本乡镇,借助问卷星平台随机在每个样本乡镇抽取 18—22 个社区居民进行在线填答。本次调研共计发放问卷 350 份,剔除缺失值较多及存在异常值、极端值的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 316 份,问卷有效率达 90.29%,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居民自身及家庭特征、生计资本情况、互联网使用情况以及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活动情况等信息。样本的基本特征信息如表 1 所示。

1.2 变量选取

1.2.1 被解释变量

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程度(民族“三交”)。本研究主要参考陈婷和赵晓娜的研究^[11],将民族“三交”行为划分为交往、交流和交融三个独立的层次,其中底层是民族交往、中层是民族交流,上层则是民族活动的高级形态民族交融,三个层次相互递进,以此深化,逐步提升。其中,交往部分是民族间最常发生的活动行为,包括与其他民族居民共同参与某项活动、相互照应和扶持等多种形式;而交流则相对交往的频率稍低,需要具备一定的主观意向,包括打招呼、聊天和网络互动等形式;交融则需要客观条件成熟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发生,包括与其他民族成员建立朋友、邻居甚至婚恋等多种关系的活动。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采用五级制李克特量表的方法,设置的所有量表题的选项均由 1 分到 5 分,

反映被访者主观层面“非常不愿意”到“非常愿意”的五种程度。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人在广场、公园锻炼身体”“参加其他民族的节日庆典”和“去其他民族的人家里拜访或者串门走访”三个题目来度量民族地区居民的交往程度;通过“见到其他民族的人打招呼”“主动与其他民族的人聊天”和“其他民族的人在网上互动”三个题目来度量民族地区居民的交流程度;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人成为朋友”“与其他民族的人成为邻居”和“与其他民族的人结婚”三个题目来度量民族地区居民的交融程度,以此分别形成本研究交往、交流和交融三个被解释变量,共同反映民族“三交”情况。

1.2.2 核心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本研究主要参考任天浩和朱多刚的研究^[12],采用居民的互联网使用频率进行度量。互联网的使用频率主要指居民在固定时间内使用互联网这一媒介进行活动的次数,结合民族地区的特色及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本研究采用“使用互联网观看其他民族新闻或短视频的频率”“在互联网中与其他民族互动交流的频率”“使用互联网购买其他民族特产的频率”三个题目反映被访者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同时采用“使用互联网观看其他民族新闻或短视频的时长”“在互联网中与其他民族互动交流的时长”及“使用互联网购买其他民族特产的金额”衡量被访者的互联网使用程度,在稳健性检验中对核心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信息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 basic 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

变量	分组	频次	百分比/%	变量	分组	频次	百分比/%
民族	汉族	240	75.95	学历	小学及以下	65	20.57
	回族	19	6.01		初中	64	20.25
	蒙古族	25	7.91		高中/中专	149	47.15
	满族	12	3.80		本科/大专	29	9.18
	维吾尔族	13	4.11		研究生以上	9	2.85
	其他少数民族	7	2.22	健康状况	非常差	24	7.59
户籍所在地	农村	162	51.27		比较差	29	9.18
	城市	154	48.73		一般	80	25.32
年龄	18岁以下	32	10.13		比较好	61	19.30
	18—36岁	42	13.29		非常好	122	38.61
	37—55岁	126	39.87	月收入	3 000元以下	74	23.42
	55岁以上	116	36.71		3 001—6 000元	62	19.62
性别	女性	129	40.82		6 001—9 000元	98	31.01
	男性	187	59.18		9 001—12 000元	66	20.89
居住的时间	1年以下	104	32.91		12 001元以上	16	5.06
	1—5年	127	40.19				
	5年以上	85	26.90				

解释变量进行替换。

1.2.3 中介变量

民族地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民生“三感”)。有研究已经证实了互联网使用对民生“三感”的正向作用^[13-15],但并没有对民生“三感”在互联网使用与民族“三交”行为之间发挥的作用进行检验,也尚未有研究关注到民族地区民生“三感”在数字信息时代的重要性,并将其与民族“三交”行为联系起来。本研究参考段忠贤和吴鹏的研究^[16],采用“您认为目前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生活水平和您的努力比起来相对公平”衡量被访者的获得感水平;采用“您认为您和其他民族在一起生活得还算幸福”衡量

被访者的幸福感水平;采用“您认为大多数其他民族的人是可以信任的”衡量被访者的安全感水平。

1.2.4 控制变量

为避免研究结果受到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影响,本研究对可能与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行为相关的其他因素纳入模型中加以控制,缓解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具体的变量选取主要参考吕春英的研究^[17],选取民族、户籍所在地、年龄、性别、居住的时间、学历、健康状况和月收入作为本研究

的控制变量。
所选取变量的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2和图1所示。

表2 变量选取及定义
Table 2 Variable selection and definition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测试问题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交往	IT1	与其他民族的人在广场、公园锻炼身体	非常不愿意=1;不愿意=2;一般=3;愿意=4;非常愿意=8
		IT2	参加其他民族的节日庆典	非常不愿意=1;不愿意=2;一般=3;愿意=4;非常愿意=9
		IT3	去其他民族的人家里拜访或者串门走访	非常不愿意=1;不愿意=2;一般=3;愿意=4;非常愿意=10
	交流	EC1	见到其他民族的人打招呼	非常不愿意=1;不愿意=2;一般=3;愿意=4;非常愿意=5
		EC2	主动与其他民族的人聊天	非常不愿意=1;不愿意=2;一般=3;愿意=4;非常愿意=6
		EC3	和其他民族的人在網上互动	非常不愿意=1;不愿意=2;一般=3;愿意=4;非常愿意=7
	交融	IM1	与其他民族的人成为朋友	非常不愿意=1;不愿意=2;一般=3;愿意=4;非常愿意=11
		IM2	与其他民族的人成为邻居	非常不愿意=1;不愿意=2;一般=3;愿意=4;非常愿意=12
		IM3	与其他民族的人结婚	非常不愿意=1;不愿意=2;一般=3;愿意=4;非常愿意=13
核心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频率	IU1	使用互联网观看其他民族新闻或短视频的频率	一周0次=1;一周1—3次=2;一周4—6次=3;一周6—9次=4;一周10次以上=5
		IU2	在互联网中与其他民族互动交流的频率	一周0次=1;一周1—3次=2;一周4—6次=3;一周6—9次=4;一周10次以上=5
		IU3	使用互联网购买其他民族特产的频率	一周0次=1;一周1—3次=2;一周4—6次=3;一周6—9次=4;一周10次以上=5
	互联网使用程度	IU4	使用互联网观看其他民族新闻或短视频的时长	一天0小时=1;一天1~2小时=2;一天3~4小时=3;一天5~6小时=4;一天6小时以上=5
		IU5	在互联网中与其他民族互动交流的时长	一天0小时=1;一天1~2小时=2;一天3~4小时=3;一天5~6小时=4;一天6小时以上=5
		IU6	使用互联网购买其他民族特产的金额	年购买0元=1;年购买0~500元=2;年购买501~1000元=3;年购买1001~1500元=4;年购买1500元以上=5

续表 2 变量选取及定义

Continued Table 2 Variable selection and definition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测试问题	变量定义
中介变量	民族共同体三感 (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EG	您认为目前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生活水平和您的努力比起来相对公平	非常不同意=1;比较不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EH	您认为您和其他民族在一起生活得还算幸福	非常不同意=1;比较不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ES	您认为大多数其他民族的人是可以信任的	非常不同意=1;比较不同意=2;一般=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控制变量	民族	EL	您属于哪个民族	汉族=1;回族=2;蒙古族=3;满族=4;维吾尔族=5;其他少数民族=6
	户籍所在地	DM	您的户籍所在地属于城市还是农村	农村=0;城市=1
	年龄	AG	您的年龄范围是	18岁以下=1;18—36岁=2;37—55岁=3;55岁以上=4
	性别	GD	您的性别是	男=1;女=0
	居住的时间	LT	您在贵阳市内居住的时间是	1年以下=1;1—5年=2;5年以上=3
	学历	ED	您的最高学历是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本科/大专=4;硕士研究生及以上=5
	健康状况	HT	您的健康状况是	非常差=1;比较差=2;一般=3;比较好=4;非常好=5
	月收入	MI	您的月收入是	3 000元以下=1;3 001—6 000元=2;6 001—9 000元=3;9 001—12 000元=4;12 001元以上=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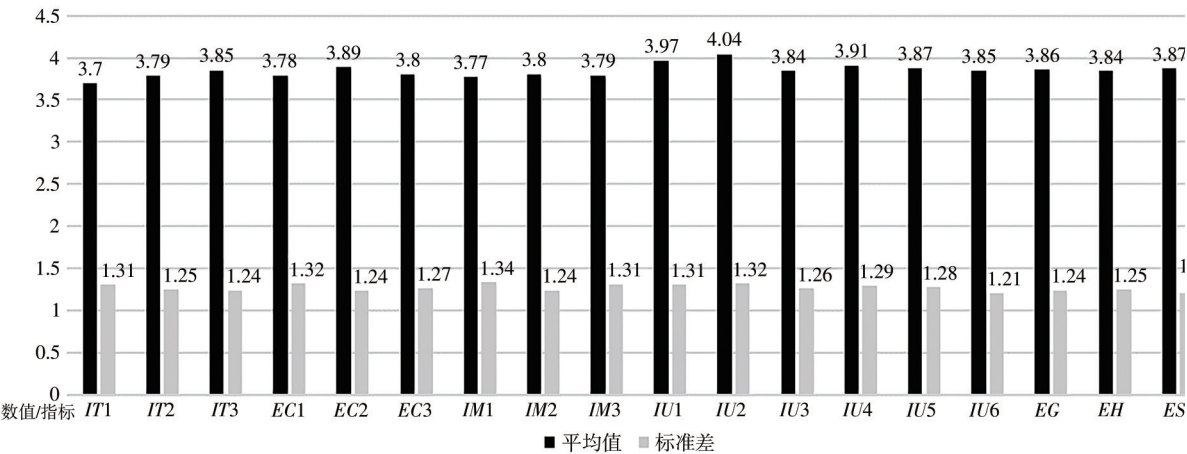


图 1 相关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Figure 1 The average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relevant variables

1.3 模型设定

1.3.1 基准回归模型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为考察民族地区居民互联网使用对其自身交往、交流和交融行为的影响,构建如下基准模型,如式(1)—(3):

$$IT=\alpha_1+\beta_1controls+\beta_2IU+\epsilon$$
 (1)

$$EC=\alpha_1+\beta_1controls+\beta_2'IU+\epsilon$$
 (2)

$$IM=\alpha_1+\beta_1controls+\beta_2''IU+\epsilon$$
 (3)

其中:IT、EC和IM分别表示核心解释变量民族地区居民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行为;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 β_1 表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IU表示互联网使用; α_1 表示常数项; β_2 、 β_2' 和 β_2''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待估系数; ϵ 表示随机误差项。

1.3.2 中介效应模型

为有效分析互联网使用与民族地区交往、交流和交融之间的作用机理,通过借鉴 Baron 和 Kennt^[18]

交流和交融的活动就会越多,系数分别为0.723 1、0.717 3和0.745 6,逐渐递增,说明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交流的影响相对较小、交往的影响一般、对交融的影响程度较大。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and analysis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IT	EC	IM
IU	0.723 1*** (0.032 9)	0.717 3*** (0.037 7)	0.745 6*** (0.036 0)
EL	-0.015 4 (0.030 3)	0.000 8 (0.032 0)	-0.037 5 (0.029 9)
DM	-0.084 3 (0.086 5)	-0.121 7 (0.089 0)	0.033 1 (0.086 3)
AG	-0.057 3 (0.063 7)	-0.076 2 (0.067 1)	-0.067 8 (0.060 9)
GD	0.017 9 (0.085 9)	0.023 1 (0.086 7)	0.029 0 (0.089 7)
LT	0.023 2 (0.056 7)	0.029 5 (0.059 3)	-0.000 5 (0.055 0)
ED	0.035 0 (0.043 8)	0.036 2 (0.038 8)	0.029 4 (0.043 2)
HT	-0.138 0*** (0.031 3)	-0.124 6*** (0.038 9)	-0.122 5*** (0.032 2)
MI	-0.006 2 (0.045 1)	0.001 1 (0.045 3)	-0.026 8 (0.049 9)
常数项	1.549 2*** (0.276 4)	1.573 7*** (0.313 1)	1.526 0*** (0.284 5)
观测数	316	316	316
R ²	0.589	0.573	0.599

注:括号里的数值是稳健的标准误;***代表 $p<0.01$,即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代表 $p<0.05$,即在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代表 $p<0.1$,即在10%的置信区间内显著,下同。

2.3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回归中结果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的模型(4)至模型(6)所示。互联网使用程度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和交融均在1%的置信区间水平上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说明互联网使用程度也可以显著促进民族地区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活动,同时系数分别为0.733 8、0.728 5和0.755 6,仍然证明了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交流的影响相对较小、对交往的影响一般、对交融的影响程度较大的结论,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科学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及分析
Table 5 Stability test results and analysis

变量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IT	EC	IM
IU_U	0.733 8*** (0.034 3)	0.728 5*** (0.037 9)	0.755 6*** (0.035 4)
EL	-0.012 7 (0.029 3)	0.003 5 (0.031 1)	-0.034 7 (0.030 5)
DM	-0.097 1 (0.088 0)	-0.134 4 (0.090 1)	0.019 9 (0.087 9)
AG	-0.039 8 (0.065 2)	-0.059 0 (0.069 3)	-0.049 8 (0.064 9)
GD	0.014 1 (0.086 9)	0.019 4 (0.087 3)	0.025 1 (0.090 3)
LT	0.050 6 (0.058 5)	0.056 5 (0.060 2)	0.027 9 (0.056 3)
ED	0.027 9 (0.044 6)	0.029 2 (0.040 5)	0.022 0 (0.044 4)
HT	-0.142 9*** (0.032 2)	-0.129 6*** (0.039 4)	-0.127 3*** (0.034 1)
MI	-0.028 3 (0.045 9)	-0.020 8 (0.046 7)	-0.049 6 (0.050 9)
常数项	1.552 9*** (0.281 5)	1.575 7*** (0.324 6)	1.532 9*** (0.300 8)
观测数	316	316	316
R ²	0.571	0.557	0.579

2.4 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和交融影响的作用机制

为检验民生“三感”(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在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和交融行为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逐步法的形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第一步将民生“三感”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互联网使用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中模型(7)所示,互联网使用对民生“三感”在1%的置信区间水平上呈正向显著作用,系数为0.915 3;第二步将民生“三感”也纳入模型中,分别将民族地区交往、交流和交融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互联网使用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6中模型(8)至模型(10)所示,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和交融仍在1%的置信区间水平上呈正向显著作用,而民生“三感”对民族地区交往在5%的置信区间水平上呈正向显著作用,对民族地区交流在10%的置信区间水平上呈正向显著、但对民族地区交融的正向作用并不显著,说明民生“三感”仅在互联网使用对民族交往和交流的促进过程中发挥

显著正向的中介作用,但在互联网使用对民族交融促进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可能的一种解释是,民族间的交融活动是交往与交流的高级阶段,可能受到更多其他组合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互联网使用和民生“三感”。其他社会、文化和经济等交互因素可能在影响民族地区交融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而削弱了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表6 中介效应机制检验结果及分析

Table 6 Test results and analysis of intermediary effect mechanism

变量	模型(7) GG	模型(8) IT	模型(9) EC	模型(10) IM
IU	0.915 3*** (0.018 0)	0.454 7*** (0.119 4)	0.515 5*** (0.121 3)	0.604 8*** (0.123 9)
GG		0.293 2** (0.121 7)	0.220 5* (0.126 6)	0.153 9 (0.128 5)
EL	-0.011 4 (0.019 0)	-0.012 0 (0.029 2)	0.003 3 (0.030 7)	-0.035 7 (0.029 7)
DM	-0.048 9 (0.042 2)	-0.069 9 (0.085 5)	-0.110 9 (0.089 3)	0.040 6 (0.087 1)
AG	-0.017 2 (0.031 0)	-0.052 2 (0.063 5)	-0.072 4 (0.067 4)	-0.065 2 (0.061 5)
GD	-0.014 9 (0.044 3)	0.022 3 (0.084 9)	0.026 4 (0.086 0)	0.031 3 (0.089 6)
LT	-0.015 2 (0.028 3)	0.027 7 (0.056 7)	0.032 8 (0.058 6)	0.001 8 (0.054 6)
ED	0.038 5* (0.021 7)	0.023 8 (0.043 6)	0.027 7 (0.038 4)	0.023 5 (0.043 9)
HT	0.034 9** (0.017 1)	-0.148 3*** (0.030 9)	-0.132 3*** (0.038 9)	-0.127 9*** (0.032 4)
MI	0.024 4 (0.023 5)	-0.013 3 (0.044 0)	-0.004 2 (0.044 6)	-0.030 5 (0.050 1)
常数项	0.078 9 (0.128 3)	1.526 1*** (0.271 3)	1.556 3*** (0.310 9)	1.513 9*** (0.284 4)
观测数	316	316	316	316
R ²	0.911	0.597	0.578	0.601

2.5 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和交融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鉴于不同民族自身特点、风俗习惯与语言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其对于民族“三交”行为的态度可能存在差异,同时对互联网使用的可得性和熟练程度也不相同,因此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进行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和交融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从模型(11)与模型(12)中可得,互联网使用对汉族、少数民族居民民族间交

往活动均在1%的置信区间水平上呈显著正向作用,系数分别为0.734 8和0.750 4,组间系数检验 p 值为0.568 8 >0.1 ,说明互联网使用对于汉族和不同民族的民族间交往活动的正向作用不存在异质性;从模型(13)与模型(14)中可得,互联网使用对汉族、少数民族居民民族间交流活动均在1%的置信区间水平上呈显著正向作用,系数分别为0.741 4和0.657 0,组间系数检验 p 值为0.054 2 <0.1 ,说明互联网使用对于汉族和不同民族的民族间交流活动的正向作用在10%的置信区间水平上存在异质性,即对于汉族的正向作用更强;从模型(15)与模型(16)中可得,互联网使用对汉族、少数民族居民民族间交流活动均在1%的置信区间水平上呈显著正向作用,系数分别为0.761 1和0.682 4,组间系数检验 p 值为0.035 0 <0.05 ,说明互联网使用对于汉族和不同民族的民族间交融活动的正向作用在5%的置信区间水平上存在异质性,即对于汉族的正向作用更强。可能的一种解释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文化、社会和历史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影响他们对互联网使用的态度、习惯以及使用水平,进而影响到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交流和交融的作用效果。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通过社会认知理论和实证检验了互联网使用与民族地区交往、交流和交融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民族“三交”均在1%的置信区间水平上呈显著正向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0.723 1、0.717 3和0.745 6,即互联网使用可以有效促进民族地区居民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活动;第二,民生“三感”在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居民的交往和交流活动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但在互联网使用对民族地区居民的高阶交融活动中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第三,在异质性分析中,研究发现了互联网使用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交流和交融方面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但在基础交往活动方面的异质性并不显著。

3.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注重民族地区互联网普及和技能培训。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19],特点是“创新”,关键点在于“质优”,本质则是“先进生产力”。这对目前仍与其他地

表 7 异质性检验结果及分析

Table 7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and analysis

变量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汉族	少数民族	汉族	少数民族	汉族	少数民族
	<i>IT</i>	<i>IT</i>	<i>EC</i>	<i>EC</i>	<i>IM</i>	<i>IM</i>
<i>IU</i>	0.734 8*** (0.036 1)	0.750 4*** (0.086 0)	0.741 4*** (0.041 6)	0.657 0*** (0.086 5)	0.761 1*** (0.040 1)	0.682 4*** (0.087 8)
<i>EL</i>	—	0.082 8 (0.064 5)	—	−0.009 4 (0.054 8)	—	−0.070 1 (0.052 4)
<i>DM</i>	−0.092 0 (0.099 6)	0.021 7 (0.184 1)	−0.084 7 (0.103 4)	−0.225 7 (0.173 3)	0.023 8 (0.101 0)	0.050 9 (0.157 8)
<i>AG</i>	−0.085 9 (0.074 4)	0.087 0 (0.120 1)	−0.137 5* (0.078 6)	0.064 0 (0.116 1)	−0.061 5 (0.067 4)	−0.114 4 (0.125 2)
<i>GD</i>	0.027 1 (0.098 6)	0.013 7 (0.175 2)	0.050 4 (0.101 2)	−0.003 7 (0.177 5)	0.075 9 (0.108 6)	−0.101 0 (0.159 8)
<i>LT</i>	0.037 3 (0.067 1)	−0.041 9 (0.105 8)	−0.023 8 (0.075 0)	0.196 6** (0.080 7)	−0.008 9 (0.065 0)	0.027 3 (0.113 2)
<i>ED</i>	0.012 9 (0.054 7)	0.054 9 (0.062 1)	0.018 8 (0.047 4)	0.038 2 (0.064 6)	0.010 7 (0.052 2)	0.074 0 (0.074 3)
<i>HT</i>	−0.163 3*** (0.040 7)	−0.117 8** (0.048 6)	−0.165 0*** (0.045 6)	−0.043 0 (0.072 3)	−0.132 9*** (0.039 8)	−0.105 8* (0.057 9)
<i>MI</i>	0.009 7 (0.051 4)	−0.115 0 (0.097 5)	0.034 9 (0.053 6)	−0.079 5 (0.091 2)	−0.017 4 (0.054 4)	−0.069 1 (0.108 4)
常数项	1.670 8*** (0.318 4)	0.818 0 (0.674 9)	1.839 5*** (0.364 7)	1.045 8 (0.746 4)	1.459 6*** (0.305 4)	1.992 4*** (0.657 2)
组间系数检验 T 值	0.84		1.94		2.11	
组间系数检验 P 值	0.568 8		0.054 2		0.035 0	
观测数	240	76	240	76	240	76
<i>R</i> ²	0.593	0.608	0.578	0.605	0.597	0.619

区存在一定差距的民族地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发展民族地区的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与民族之间要素的流动,加强民族地区的互联网普及与技能培训可以有效发展民族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提高民族地区交往、交流和交融水平,为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途径。

第二,关注民族地区民生“三感”的实际情况。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强调,要让各族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至关重要^[20]。互联网建设作为一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仅对民族地区民生“三感”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够通过影响民生“三感”来间接作用于民族地区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但目前在高阶交融活动方面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和相关机构着力下沉基层,特别关注提高民族地区,尤其是脱贫地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着重优化政策组合,在交往交流活动的基礎上充分发挥其在互联网使用与民

族交融活动之间发挥出积极的间接效应,同时针对性地对其数字基础建设等公共服务短板进行补齐,切实打通民族“三交”的有效“互联网+”渠道。

第三,优化民族地区差异化政策。鉴于民族地区内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互联网熟悉程度和使用条件并不一致,其运用互联网进行民族“三交”时的习惯和方式也并不相同,为防止由于“数字鸿沟”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应简单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建议针对不同民族的特点和需求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尤其是交流当中语言的异质性以及交融当中文化习俗的异质性,以更好地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和交融活动,缓解民族间异质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刘博. 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力方向与传播策略[J]. 新疆社会科学, 2022(06): 87-96, 178. DOI:10.20003/j.cnki.xjshkx.2022.06.009.

- [2] 李联廉,杨妍茜. 新媒体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实践[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40(06): 46-54. DOI: 10.13727/j.cnki.53-1191/c.20231106.002.
- [3] 倪培强,谭乾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论断的三维阐释[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43(03): 17-25, 181-182. DOI: 10.19898/j.cnki.42-1704/C.20221028.01.
- [4] 苏鹏,杨文顺. 监控互联网情助推民族地区党建工作智能化[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36(02): 31-33. DOI: 10.13727/j.cnki.53-1191/c.2019.02.006.
- [5] 严庆,马鑫. “互联网+民族团结进步”实践及其价值分析:以民族团结进步微信公众号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22, 43(01): 58-65. DOI: 10.13965/j.cnki.gznmzyj10026959.2022.01.008.
- [6] 王运,陈艳. 复制型民族村寨的旅游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以云南民族村为例[J]. 艺术研究, 2022(05): 138-140. DOI: 10.13944/j.cnki.ysyj.2022.0238.
- [7] 张龙,曹晔阳. 以数字赋能和舆论引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媒体平台建设对西藏地区发展的影响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43(04): 130-139. DOI: 10.3969/j.issn.1004-3926.2022.04.016.
- [8] LIU H, ZHOU Q, LIANG S. Digital inclusion in public services for vulnerable groups: A systematic review for research themes and goal-action framework from the lens of public service ecosystem theory[J].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025, 42(2): 102019. DOI: 10.1016/j.giq.2025.102019.
- [9] RAIHAN M M H, SUBROTO S, CHOWDHURY N, et al. Dimensions and barriers for digital (in)equity and digital divide: a systematic integrative review[J].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ety*, 2025, 4(2): 111-127. DOI: 10.1108/DTS-04-2024-0054.
- [10] HELSPER J E. The Social Relativity of Digital Exclusion: Applying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to Digital Inequalities[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7, 27(3): 223-242. DOI: 10.1111/comt.12110.
- [11] 陈婷,赵晓娜. 交往交流交融对民族地区社会资本的影响研究:以青海省为例[J]. 青海社会科学, 2021(06): 135-141. DOI: 10.14154/j.cnki.qss.2021.06.010.
- [12] 任天浩,朱多刚. 网络空间的实践与融入:西部农村少数民族互联网使用研究[J]. 西北民族研究, 2021(01): 178-191. DOI: 10.16486/j.cnki.62-1035/d.20210202.008.
- [13] 雷晓康,陈泽鹏. 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2(4): 58-68. DOI: 10.15886/j.cnki.hnus.202109.2211.
- [14] 范香花,许春晓. 民族旅游地区妇女幸福感的多维透视:生成机理与影响机制[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5, 43(02): 36-47, 129. DOI: 10.16614/j.gznj.zrb.2025.02.004.
- [15] ZHONG J W, WU W B, ZHAO F S.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nese residents: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13: 950287. DOI: 10.3389/fpsyg.2022.950287.
- [16] 段忠贤,吴鹏. “民生三感”测评指标体系构建及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24): 171-175. DOI: 10.13546/j.cnki.tjyjc.2021.24.037.
- [17] 吕春英.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CSS2019数据的实证分析[J]. 时代经贸, 2024, 21(01): 32-37. DOI: 10.19463/j.cnki.sdjm.2024.01.019.
- [18] BAERON R M, KENNT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 1173-1182. DOI: 10.1037/0022-3514.51.6.1173.
- [19]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2024, 49(04): 4-6. DOI: 10.3969/j.issn.1673-288X.2024.04.003.
- [20] 习近平.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J]. 社会主义论坛, 2019(07): 4-6.



莫力,女,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2014年毕业于云南大学,获民族学博士学位;“兴滇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边疆民族农业科技史研究,尤其关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着力于思考如何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一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保护与挖掘研究”及其他与遗产研究相关省部级项目3项。在 *Agriculture*(SCI二区)、*Forests*(SCI二区)、*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SCI三区)、*中国科技史杂志*、*中国农史*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2篇;参与出版著作1部。



陈颂,女,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技术史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史;主持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研究生项目、第17届云南农业大学学术创新创业行动基金项目等多个项目;以第二作者身份在《中国科技史杂志》、*Agriculture, Forests,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发表学术论文4篇,以通讯作者身份在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发表学术论文2篇。Email:chens001216@163.com

(责任编辑:彭 鹏)